

阳明心学对内在人格养成与社会伦理建设的正向价值

肖 桂, 吴小丽*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8日

摘 要

当代社会心态问题日益凸显, 焦虑、对立与疏离等负面情绪广泛蔓延, 映现出个体价值尺度的外在化与公共精神的消解。阳明心学以“心即理”为本体论根基, 以“知行合一”为实践法则, 为化解上述困境提供了内在驱动的解决路径。从个体自洽、人际共情与社会担当三个维度, 系统阐释“致良知”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机制: 个体层面通过价值尺度的内转重构精神原点, 人际层面经由克己共情消解对立, 公共层面则以职业良知激发责任自觉。

关键词

阳明心学, 致良知, 知行合一, 社会心态

The Positive Value of Yangming's Confucianism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er Person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thics

Gui Xiao, Xiaoli Wu*

Yangming and Guizhou Research Institute, Guiyang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ugust 7, 2026; accepted: August 2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8, 2026

Abstract

Contemporary social mentality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ith negative emotions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肖桂, 吴小丽. 阳明心学对内在人格养成与社会伦理建设的正向价值[J]. 哲学进展, 2026, 15(9): 151-159.

DOI: 10.12677/acpp.2026.159432

such as anxiety, antagonism, and alienation becoming widespread. These phenomena reflect the externalization of individuals' value standards and the erosion of public spirit. Grounded in the ontological proposition that "the mind is principle" (xin ji li) and guided by the practical doctrine of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zhi xing he yi), Yangming's School of Mind offers an internally driven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se dilemma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cret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extension of innate moral knowledge" (zhi liangzhi) may be practiced in everyday life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dividual self-consistency, interpersonal empath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t reconstructs one's spiritual foundation through the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 standards; at the interpersonal level, it mitigates antagonism through self-restraint and empathy; and at the public level, it fosters a consciou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rofessional conscience.

Keywords

Yangming's School of Mind, Extension of Innate Conscienc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Social Menta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阳明心学的实践并非抽象的“修身”，而是贯穿于个体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社会治理的具体场景中，其对不同社会角色的心态引导具有明确指向性。而阳明心学并非书斋里的抽象思辨。它出现在普通人每一天的琐碎里，活在人与人的摩擦中，亦活在公共生活的运转之间。这套学问中把高深的哲学拉回到了地面，用“知行合一”[1]这根线，贯穿了个体的困惑、人际的纠葛与社会的治理。而说到底，它教人如何通过“致良知”[1]，把那颗本是光明的心擦亮，将外在的道理化为内在的动力，从而安顿自己、温暖他人、融入社会。

2. 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阳明心学的研究主要围绕“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核心命题，学界展开了相关的义理辨析与体系建构。

2.1. 思想史维度的理论阐释

如张新民在《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2]中从德性生命的实践角度切入，系统论证了王阳明(1472~1529)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指出“致良知”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个体贪念造成的良知昏蔽，另一方面又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吴震在《论王阳明“一体之仁”的仁学思想》[3]中聚焦于“万物一体”论，指出“一体之仁”才是阳明学重构万物一体论的核心观念与本体依据——正是由于“一体之仁”，才使万物与人类、天道与人性构成了一体同在的“同一性”。北京大学张学智在《王阳明心学的精神与智慧》[4]中指出，“致良知”不仅关乎道德判断，也包含理性、情感、意志、直觉等精神活动诸方面，体现为人的精神本体的整合；在复杂现实处境中不断体认和确立良知，是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所在。清华大学陈来在《王阳明晚年思想的感应论》[5]中则强调，王阳明晚年的“万物同

体”观是通过心与物的感应关系来证明心物的一体性,与以往理学家从此物与彼物的联系来证明万物一体的路径判然有别。

2.2. 应用维度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阳明心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李承贵在《王阳明“致良知”的内容、条件及效应》[6]中对“致良知”的内涵、条件与效应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致良知”在本体、工夫、实践三个层次上构成有机体系,其效应包括“可应对千变万化之事象”“可以推行万物一体之仁”“可以治疗消极之心态”等多重功能。陈立胜在《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解——兼论〈节庵方公墓表〉问世的一段因缘》[7]中对“四民异业而同道”的命题做了重新诠释,指出该命题出自《节庵方公墓表》,被余英时(1930~2021)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第四次重大突破”中“一篇划时代的文献”。在阳明心学与当代心理健康的交叉领域,舒曼指出阳明心学的“事上磨炼”与现代心理疏导机制形成理论呼应。总体来看,应用维度的研究正在从宏观呼吁走向具体的机制分析,但多数成果仍集中于某一特定领域,尚缺乏对阳明心学介入社会心态问题的系统性考察。

2.3. 跨文化视野中的阳明学诠释

在国际汉学与比较哲学领域,阳明心学同样受到持续关注。王庆节在《现象学的现象、海德格尔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兼论现象学家耿宁先生的阳明学》[8]中阐述了瑞士现象学家耿宁以现象学进路诠释王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其研究颇具代表性。耿宁认为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作为向善的秉性与倾向,二是作为本原意识,三是作为始终完善的本原知识的本己本质。他尤其重视良知“自知”的特点,将其理解为一种道德实践意义上的自知与自觉,而非纯理论的认知。陈立胜在评析耿宁的研究时指出,耿宁的工作呈现出现象学与阳明心学互动、互释的风格,使阳明心学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亦有助于中国心学走向世界哲学的舞台。

上述研究在三个方向上都取得了进展,但亦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缺环:个体修养、人际共情与社会担当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贯通尚不充分——多数研究或聚焦于某一维度而失之局部,或止于宏观呼吁而缺乏具体的实践机制分析。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知行合一”为贯穿线索,从个体精神秩序的重建、人际冲突的消解到公共信任的生成,逐层考察“致良知”由内而外的实践展开,以期呈现阳明心学介入当代社会心态问题的完整路径。

3. 内在人格的养成

普通个体的负面心态,如迷茫、浮躁、抱怨等,多是源于“向外求而不得”:既渴望符合社会标准,呈现方式,如成功、财富等,又因能力或机遇不足而痛苦。王阳明看得明白,这痛苦的根子,无非是“心”跟着外物跑了。当代社会心理学中,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1919~1989)在1954年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中曾指出:个体在缺乏客观标尺时,倾向于将他人作为参照点来评估自身,而这种与更优秀者比较往往带来挫败与焦虑。王阳明在五百年前,便已洞察了这种痛苦的根源,他一语道破:“有源者由己,无源者从物”。如果人们把价值的裁决权托付给了变动不居的外境,这正是焦虑得以滋生的根源。

阳明心学给今人的,不是一套现成的成功法则,它更像一面向内照的镜子。让人在赶路时偶尔停下来问一句:我到底在忙些什么?推着我不往前走的,是外界喧嚣的声响,还是自己内心真正认可的方向?由此引向一个更深刻的洞见:“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1]。我们误以为“知”是脑子里独立的知识,“物”是心外冷漠的对象,于是“心”与“物”对峙,“知”与“行”脱节。我们追逐外物,却忘了那被追逐的“物”的意义,恰恰是我们的“心”在追逐的活动中共

同赋予的。一旦“心”把自己当成了客体的旁观者,便立刻丧失了家园感,漂泊无依。正如“心外无物”而万物一体,故心知即意,意即念,念即行,行即物,物即身:知、意、念、身、行、物皆为良知心体的开显而一体不分,王阳明谓之:“身、心、意、知、物是一件”[9]。而修养的要义,正在于重新学习如何完整地活在每一个当下。不必刻意求玄,日常的应对酬酢间,便是让那“一件”重新贯通起来的道场。

3.1. “心即理”的认知重构

王阳明指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10]。现代认知行为疗法的一个基本预设是:情绪困扰源于个体对事件的认知歪曲,调整认知即可改变情绪反应。这一思路与“心即理”存在结构上的相似,但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认知疗法将“认知”视为一种可以被工具性地调整的心理过程,而王阳明所说的“心”不是一个可以被主体操纵的对象,它本身就是主体。“心即理”意味着真正的价值尺度不在别处,就在你自己那颗本自具足的良心里。看到身边人买房买车、升职加薪,心里翻腾起酸楚与急切时,不妨先问自己:我的向往,是出于良知认可的踏实努力,还是被虚荣裹挟的盲目攀比?如果是前者,那么即便暂时未能如愿,也可以心安理得,因为你的路走得正。王阳明讲“素其位而行”[1],在什么位置就做什么事,不怨天、不尤人,这种“自得”的快乐,是从心里长出来的。若是后者,那攀比的念头本身,就是欲望的蒙蔽。认清了,它也就散了。

3.2. “事上磨炼”的行为实践

心态调适不能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的“知解”。王阳明所倡导的“事上磨炼”工夫,强调个体须嵌入具体事务情境之中砥砺心性,方能建立稳定的内在定力,实现动静之间皆可持守本心的精神状态。这一修养路径与当代现实境遇具有内在契合性:职场困境、人际冲突、目标落空等生活事件所引发的情绪扰动,均可视为心性修炼的实践场域。当个体遭遇外界非议或行动失败时,首要反应应当摒弃怨怼情绪与自我否定,回归事件本身并诉诸良知自省:自身是否已竭尽所能?行事是否顾及他人利益?倘若反躬自省而无愧于心,则挫折可视作自我成长所付出的必要代价;如若确然存在疏漏与不足,则应当正视问题、诚心改过,在实践迭代之中完成心性的淬炼。王阳明说“悔悟是去病之药”[1],但改过方为实效。就这样,每一次外来的“烦恼”,都可能变成内心澄明的契机,所谓“动亦定,静亦定”的从容,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打磨中积攒出来的。

3.3. “致良知”的持续贯通

良知人人本具,但是如果不主动去“致”,它亦会被欲望所遮蔽。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须时时觉察、刻刻践行,犹园丁之除莠,去而复生,故当日日拂拭。真正的成长并不是去追求某个“开悟”的瞬间,而是去学会接受反复、去允许缓慢,于寻常日子中持续返归内心之光明。现代道德心理学中,乔纳森·海特的社会直觉主义模型指出,道德判断主要由快速、自动的直觉所驱动,理性推理往往只是在判断形成之后提供事后说明。若仅停留于此,“良知”似乎与一般的道德直觉并无分别。然而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乔纳森·海特的直觉模型并不承诺直觉本身的普遍有效性,而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却具有“无间于圣愚”的先天性与普遍性——它不是一个可以被文化或历史相对化的经验事实,由此,“致良知”的工夫就不只是“跟着感觉走”,而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辨别何者是良知的真实呈现,何者是欲望的伪装。与人相处时起了怨恨心,当其萌动时,不压抑也不放纵,而是以良知观照之:这份怨气是出于公道,还是出于偏私?若是后者,即可当下转念。心中贼是最难破的,然正因其难,尤须日进不已。就这样,把“致良知”变成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习惯,不必等到大事临头才去磨炼,日常的一言一行、一起心动念,都是修行的道场。久而久之,内心的安定并非来自外界顺遂,而是来自每一次选择良知时的笃定。

这种从容,正是生命最踏实的底色。

内在人格养成的要义,在于将价值的裁决权从外境收回本心。“心即理”提供了这一转向的本体论依据,“事上磨炼”给出了落实的实践路径,“致良知”则保证了这一过程的持续深化。三者并非先后次序,而是一体并行的工夫——认知、行为、觉察同时作用于个体的精神世界。经此转向,个体得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生活中构筑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原点:不为外物所牵,亦不为欲望所蔽。

4. 人际冲突的消解:基于“克己复礼”与“万物一体”的共情逻辑

邻里噪声、职场摩擦、家庭矛盾,这些困扰日常的冲突追根溯源,往往不是利益不可调和,这些矛盾往往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的结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道理天经地义,对方的想法不可理喻。在这种对立心态的泥潭里,阳明心学给出的,不是一套复杂的理论,而是一把简单却锐利的手术刀:“致良知”[1]。

这把手术刀的第一步,不是指向对方,而是指向我们自己,即是阳明心学中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1]。邻里间的“噪声”是“山中贼”,但真正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心中贼”,是自己那份被挑起的怒火,那点不容侵犯的固执以及那种“受害者”的委屈感。若不能先“克己”,把心里这些喧嚣的“贼”按下,任何沟通都只会是情绪的相互发泄。所谓克己,在王阳明那里,并非压抑自我,而是“识得真己而克去己私”[12]这意味着,我们要先分辨清楚:那个勃然大怒、誓要争个高低的“我”,是不是被私意和偏见所蒙蔽的“假我”?只有先平息这个“假我”的鼓噪,那个能感知是非、心怀恻隐的“真我”,也就是良知本体才有机会浮现。

4.1. “克己复礼”的共情实践

在阳明心学的脉络里,“克己”的真意在于“识得真己而克去己私”[12],在于冲突发生时暂且按住那个被偏见、习气与私意笼罩的“私我”,让能知是非、具足恻隐的“真我”——也就是良知本体——得以呈现。设想深夜家里持续传来噪声。在初时,心中怒意顿起,认定对方是“自私”“不顾他人”,这便是“心中贼”的典型发作:那份不容侵犯的自我正义感,以及对对方的全盘否定。然而,若是能在情绪顶点稍作停顿,向内“克己”:自问是否也曾无心打扰过他人?这一问,便是对私意的觉察与悬置。随后,以恻隐之心揣摩对方,或许事出有因?对立感便随之松动。最终,以希望被对待的方式沟通,而非指责。如此,冲突未必要升级为对抗,而可能在“克己”与“共情”中悄然化解。

现代心理学中的“共情”概念,通常被理解为感知并理解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它预设了一个明确的“自我—他者”边界,阳明的“克己复礼”,便不再是遵循刻板的外在礼仪,而是良知在“克己”后自然生发的恰当行动。当“心中贼”的硝烟散去,良知那面镜子便能更清晰地照见对方。而有这么一句话:“人得天地之心以为心,反过来,由于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13],也可说是天地之心以人心为心,这个天心与人心合一之心,实际就是仁体,这句话体现了克己修身的主动性,呼应着天地“生生”的必然性,而王阳明认为,良知中本具“恻隐之心”[14],这是人类情感共鸣的根基。于是,我们或许能试着以良知的“恻隐”去想象:对方是否遇到了什么难处?是否有其不得已的缘由?这便是推己及人的开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商量的语气取代了指责,寻求理解替代了要求服从。冲突从一种零和博弈,转化为两个主体基于共同情感与理性的协商。

4.2. “万物一体”的共同体认知

王阳明提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1],为处理人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更为根本的视角转换:不再将他

体。这种“一体”观,并非浪漫的空想,而是基于阳明对心物关系的深刻洞察。既然“心外无物”,世界的意义就由心的感应去共同构成,那么他人的痛苦与欢乐,只要能够进入我的知见,便与我的生命发生了真实的关联。社会心理学中的“共情疲劳”现象即持续共情导致心理资源耗竭,恰好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若利他的动力来自有限的认知资源,那么共情便是一种可以耗尽的能力。但若利他的根源在于“一体”的存在论事实,而非有限的认知储备,则共情便不存在“枯竭”一说,所谓的“疲劳”不过是欲望隔断一体之仁时产生的遮蔽效应。关于他人的“痛痒”,在良知觉醒了的个体看来,就不能全然看作是与自己无关。同事的成功关联着团队的整体活力,社区的和谐塑造着个人归家时的心情,这种关联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一体之仁在日用间的自然显露。由此,人与人的相处便从“争抢”走向“成全”,格局从一己得失的计较转向共生视野的展开。

4.3. 由内而外的实践路径

从“克己复礼”到“万物一体”,阳明心学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提供了一套由内省至外通、由消解对立至构建共生的一条完整路径。这条路径始于那些对自我内心偏见、情绪与私意的觉察与克制,成全于利人利己的共情合作,并最终确定于万物一体的共同体认知。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面对冲突和对立时,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去指责对方、改变环境,而是先回头去安顿好自己那颗支离破碎的心。每一次向内去“克己”,都是在减少自己心中的“心中贼”;每一次以恻隐之心去理解和帮助他人,都是在搭建一座通往共情的桥梁;每一次通过“万物一体”的视角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都是在拓宽自己的格局与包容度。如此一来,冲突不再是单纯的麻烦,而成为修炼心性的契机;他人也不再是孤立或对立的“他者”,而是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同伴。温暖而有效的人际联结,其起点永远在自己心里,你能包容多少,世界就为你打开多少。

人际冲突消解的根本路径,不在谈判技巧的提升,而在自我中心的松动。从“克己”对私我的悬置,到“复礼”对共情的自然生发,再到“万物一体”对二元对立的根本超越,阳明心学提供的是一条由内而外、从消解对立到构建共生的完整心法。其深层逻辑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从来不是靠技巧搭建的,而是靠一体的存在论事实来支撑的——人能包容多少,归根结底取决于其心中的欲望清除了多少,而非其共情能力训练了多少。

5. 公共生活的伦理嵌入:“致良知”在社会信任建构中的功能路径

社会层面的负面心态,突出表现为对公共事务的漠然与对制度规则隐隐的不信任,其根源在于一种深刻的“疏离感”,觉得自己不过是庞大机器里一颗无关紧要的零件,个人的声音与行动无法产生任何回响,于是便退回到“与我无关”的私人领地。现代社会学讨论这一现象时,通常将其归因于社会分工的高度精细化与科层制的去人格化特征——人在制度中愈是被视为一个“功能单元”,其对整体的归属感便愈趋稀薄。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恰恰为打破这种疏离,提供了一种将个体生命重新“锚定”于社会肌理之中的心法。其作用为:“可应对千变万化之事象”,“可助人实现成为圣贤之理想”“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推行万物一体之仁”“可以治疗消极之心态”“可以抵御声色名利之诱惑”“可以吸纳并为科学知识腾出空间”[6]。它并非空泛地倡导无私奉献,而是通过一套由内而外的实践逻辑,让社会责任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心不能自己的必然。其起点,在于为最平凡的日常“正名”。王阳明曾鲜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7]。士农工商,职业上虽然有分工,但“致良知”这条道路却是相通的。“致良知”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欲望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一方面又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最终将良

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2]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最终,无数个体“致良知”的微光,能汇聚成制度之外不可或缺的“柔性生态”。“良知人人皆有而无分智愚贵贱”[16],再完善的法律也有其覆盖不到的灰色地带,而良知带来的自律,恰恰能填补这片空白。这种“柔性生态”让扶起跌倒老人的犹豫,变成恻隐之心驱动的自然伸手;让在网络匿名中敲下恶语的冲动,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念头所平息。这种由内而生的道德自觉,为冷冰冰的规则体系注入了人性的温度,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运行与信任成本。这种“柔性生态”让个体明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并非遥不可及的宏大叙事,而是蕴藏在每一个凭良心做出的微小选择之中。当越来越多人以此自持,那份疏离感便会在具体的、负责任的“在场”行动中,逐渐消融。阳明心学通过“致良知”的实践,将个体道德与社会责任绑定。

5.1. “士农工商皆可致良知”的平等实践

打破社会疏离,首在回应一个根本性的困惑:一个人日复一日的劳作,究竟有没有超出谋生之外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这一问题的答案由文化传统预先给定;在现代社会中,意义日益成为个体必须独自面对的问题。马克思·韦伯(1864~1920)曾以“天职”概念描述新教伦理如何将世俗职业转化为一种“呼召”,赋予日常劳作以宗教性的超越意义。王阳明曾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7]的命题,虽以儒学宗师的身份对商人社会价值给予了明确肯定,却并未放弃“士阶层”的精英意识。他对纵欲逐利与攀比嫉妒现象的批判未尝不是对“工商精神气质”蔓延化现象的不满。士农工商,职业虽有分工,社会地位在传统语境中亦有高下,但“致良知”这条通往人格完善与社会和谐的道路,对所有人却是平等敞开的。这可谓是一场静默而深刻的价值革命。农夫的精耕、工匠的计较、商贩的诚信,都不再仅仅是谋取生计的“术”,而是在其“本职”这一最具体的“事上”,对天理良知的真切实践。

“致良知”的实践效应,正在于它可以“推行万物一体之仁”[3]。这些看似微末的,基于职业本分的正确选择,绝非孤立的个人操守。每一次选择,都是在具体而微地编织那张“万物一体”的关联之网。农人的稻谷、匠人的器具、商贩的商品,最终都将汇入一个由无数陌生“他人”构成的,庞大的生命共同体。我以良知对待我手中的“事”,便是在以最实在、最可触摸的方式,履行我对那个遥远而切近的共同体的“仁”。我的劳作,由此超越了谋生,成为一种面向整个生存网络的,无声而庄重的道德应答。

当这样的实践从零星个体的坚持,逐渐蔓延为一种被普遍感知和尊重的社会风尚时,其塑造世界的深沉力量便开始显现。试想,我们每日所食、所居、所用之物,其流转链条的背后,若都能有这样一份良知的默默托底,那么人与人之间因高度不确定而滋生的深刻戒备,那种“人人自危”的悬浮感,便有了得以着陆的坚实土壤。信任,这种现代社会中比黄金更为珍贵的隐性资本,从来不会凭空而降。信任正源于这无数看似平凡的“无名者”,在他们各自的方寸之地,对一份“不负所托”的责任承诺所进行的日复一日的沉默坚守。王阳明深信“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16],这份植根于心学根本的、对人性普遍光明面的平等信心,正是广泛的社会信任得以破土而生、并蔚然成林的起点。它不是对完美德行的奢求,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在具体岗位上,那份“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诚恳期待与内在肯定。

5.2. “地方治理”的民生实践

仅有个体的自觉尚不足以构筑完整的信任生态,阳明心学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同时为掌握公共资源的治理者指明了“致良知”的政治实践路径,即“亲民”。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绝非仅仅是内在的修养功夫,它必须“依体起用”,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广阔场域中扩充开来。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17]就可看出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中的精华。

王阳明本人便是这套理念的先锋实践者。无论是去平定地方的匪患,还是治理南赣边区的民众,他

的方法都远超于单纯的武力镇压或律法管束。历史记载,他在动乱之后必定会伴随一系列的“亲民”举措:比如说兴办社学以感召乡民,颁布《南赣乡约》以引导自治,减免苛捐杂税以使百姓休养生息。其核心逻辑,在于一种深刻的“唤醒”。治理者首先要以自身的良知行事,将心比心,体察民情,这份真诚无伪的“为民”之心本身,便是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当民众从官府的政策中感受到的不是盘剥与压迫,而是实实在在的体恤与关爱时,他们内心的良知便更容易被激发和共鸣。一种良性的治理循环就得到了肯定:官员以良知对待百姓,施行仁政;百姓就会感受到被尊重,而此生发出羞恶与是非之心,从因为畏惧刑罚而“不敢为恶”,逐渐转向为因内心认同而“不愿为恶”。官民关系,便从传统中常见的、基于怀疑与恐惧的对立,转向一种基于共同价值与信任的协作。这不只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高明的治理智慧。

阳明心学所勾勒的,远非书本中的玄思,而是一条清晰笃实、由内而外的生命实践路径。它始于我们对自我内心的深刻观察与安顿,再经由与他人真切共情的桥梁后,最终会扩展为对社会的一份清醒而温暖的担当。这条路径,为现代人安身立命、融入社会提供了具体的心法。总而言之,阳明心学的实践智慧,是从“心即理”的本体确认,到“知行合一”的生命展开,最终达成“万物一体”的境界圆成。它邀请每一个人,在具体的生命现场中,通过内心的澄明来照亮外在的世界,从而涵养出一个更从容、更温暖,也更有担当的自我与社会。这剂“心药”的温润之力,正体现在它指引我们,于内在根源处,重建与他人、与世界的健康联结。

5.3. 社会信任的自发生成

法律的完备无法替代良知的自律。扶起跌倒老人之犹豫,化为恻隐驱动之自然伸手;匿名敲下恶语之冲动,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念所平息。此由内而生的道德自觉,为规则体系注入人性温度,降低社会运行与信任成本。此种“柔性生态”之要义在于,社会责任并非遥不可及的宏大叙事,而蕴藏于每一个凭良心做出的微小选择之中。当越来越多人以此自持,疏离感便在具体的、负责任的“在场”行动中逐渐消融。王阳明深信“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此对人性普遍光明面的平等信心,正是广泛信任得以蔚然成林之起点。

公共生活伦理嵌入的核心,在于将“致良知”从个体心性修养推扩至职业伦理、治理实践与社会信任的生成机制之中。“四民异业而同道”为平凡劳作赋予超越性意义,“亲民”治理为制度信任提供良知基础,而“柔性生态”则揭示了无数个体自觉如何自发汇聚为社会信任的增量。三层逻辑逐次推进:从“我如何理解我的劳动”到“治理者如何对待民众”再到“我们如何共同编织信任之网”——阳明心学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实践智慧,不是用道德替代制度,而是通过唤醒制度参与者内在的良知自觉,使制度获得超越条文本身的运行活力与人文温度。

6. 结语

阳明心学常被视为高深的性命之学,但将其置于现代社会心态的语境中去审视,其真正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对日常生活的深切关照。从个体精神秩序的重建,到人际冲突的消解,再到公共生活中信任的生成,“致良知”的实践展开呈现出一种清晰的由内而外的逻辑递进。值得追问的是,这三层之间究竟是各自独立的,还是存在一种内在的贯通?从“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万物一体”,阳明心学实际上给出了一条完整的回答:个体通过价值尺度的内转获得自洽,但这自洽不是封闭的,一个安顿好的心,自然能感通他人;一个能感通他人的心,也必然关切共同体的命运。三层并非先后次序,而是一体之仁在不同生命场域中的显现。个体修养、人际共情与社会担当,归根结底是同一颗良知的三种开显方式。王阳明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这既是对人性普遍光明的信心,也是对每一个普通人在其

本分上可以有所作为的期许。在价值多元、信息纷繁的当代社会,这套五百年前的心法并未过时。它不提供可直接移植的方案,却指引着一种向内用力的方向,把放逐于外物的心收回来,在每一个具体的生命现场里,擦亮它,安顿它,再让它自然地照亮周遭的人与世界。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如此自持,从容、包容、有担当的社会心态便不再只是愿景,而成为可以真实生长的可能。

基金项目

贵州省 2024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四大文化工程”研究专项重点课题《阳明心学助力良好社会心态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形成的机制研究》(24GZZD1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明)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M]. 吴光, 钱明, 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2] 张新民.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J]. 王学研究, 2018(2): 3-37.
- [3] 吴震. 论王阳明“一体之仁”的仁学思想[J]. 哲学研究, 2017(1): 61-67+128.
- [4] 张学智. 王阳明心学的精神与智慧[J]. 哲学动态, 2019(11): 37-45.
- [5] 陈来. 王阳明晚年思想的感应论[J]. 现代儒学, 2021(1): 43-59.
- [6] 李承贵. 王阳明“致良知”的内容、条件及效应[J]. 学术界, 2025(6): 116-127.
- [7] 陈立胜. 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解——兼论《节庵方公墓表》问世的一段因缘[J]. 哲学研究, 2021(3): 45-55+128-129.
- [8] 王庆节. 现象学的现象、海德格尔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兼论现象学家耿宁先生的阳明学[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2): 7-12+22.
- [9] 颜圣麟. “心外无物”如何回应“是内非外”, 从“还物”说到感应本体[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9(2): 20-28.
- [10] 邓国元. 行为主体与存有本体——王阳明“心外无物”研究[J]. 哲学研究, 2021(4): 75-83.
- [11] 宁霄. “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探寻心学深处的自我超越[J]. 宁波通讯, 2025(13): 63.
- [12] 李春强. 阳明学派对“克己复礼为仁”的多维诠释及其逻辑关系构造[J]. 宁夏社会科学, 2023(3): 37-44.
- [13] 向世陵. 从“天地之心”到“恻隐之心”, 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用关系[J]. 船山学刊, 2024(1): 79-89.
- [14] 陈乔见. 从恻隐心到是非心: 王阳明良知说对儒家性善论的凝练与发展[J]. 浙江社会科学, 2018(6): 122-130+107+159.
- [15] 杨伯峻, 译注. 论语译注·颜渊篇第十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 [16] 李承贵. 王阳明对孟子良知内涵的充实与突破[J]. 天津社会科学, 2025(6): 84-90+136.
- [17] 虞建斐. 从良知到善治——王阳明社会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J]. 群言, 2020(12): 39-41.